

■个论

残保金“脱敏”，唯有公开

日前,有媒体报道,深圳市民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原职工举报该中心每年有几千万元经费,支出仅数百万元。随后深圳残联回应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非“三公”经费,按规定要公开,引发社会关注。(6月3日《人民日报》)

在谈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要不要公开的话题前,不妨看看残保金在现实中的利用情况,它或许更难揭示“神秘化”的残保金的真相。根据深圳市残联的数据,有134700残疾人的深圳,其中拥有户籍的残疾人只有75800人。而根据深圳市扶持残疾人就业补贴的相关规定,针对残疾人的创业扶持只针对深圳户籍。换言之,在深圳有将近一半的残疾人将享受不到残保金的扶持。这种标准上的限制,一方面导致了大量残保金的剩余,另一方面,也为残保金的可能被滥用留下了隐患。

当然,很难说,残保金在使用上的标准偏差与公平性问题,完全是因为“不公开”,导致监督困难所致。但至少,残保金的神秘化与缺乏监督,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开,

残保金的使用效率早已受到诟病。如2012年,广州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预算安排4.82亿元,而实际支出2.42亿元,执行率仅有50.21%。有当地人大代表就追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何连续三年执行率低?而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残保金的使用效率状况不理想也受到质疑。

不妨说,即便不考虑残保金的性质问题,在无公开的前提下,这一不菲的费用如何确保使用的效率与公正问题,显然无法给出名正言顺的答案。而如果论及民爱中心的公益组织属性,不公开就更难以让人接受。

作为残联的下属单位,民爱中心,一方面是带有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残保金的收取又是依靠行政政策的强制规定。于如此矛盾之中,其半官方色彩显而易见。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深圳残联对此的回复仅仅是残保金非“三公”经费,“按规定要公开”。这一回应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至少在潜意识里,民爱中心仍把自身更多定位为政府部门,只是该经费不属于“三公”公开的范畴。从这种自我定位上

的微妙就不难理解,当该组织完全忘却自身的公益属性,对“公开”说不,或许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就此不难理解,要破解残保金的公开难题,厘清此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偏差,应是不能回避的改革任务。

无公开就无效率,无公开也无公信。残保金在深圳的神秘化,在全国范围内也并非孤例。这类夹杂在官方与公益组织之间的公益基金,其在审计上往往能够被轻易地排除在既有的制度要求之外,因此,确保其公正性与合法性,除了强化社会监督与加大公开力度,别无他法。深圳残联回应称,因为残保金比较敏感而无法公开。那么,到底敏感在哪,不妨作出更细致的回答。如果其中真有某种讳莫如深的“敏感”,那恐怕恰恰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阳光无法抵达的缘故。因此,面对这类既不属“三公”范畴,又在实质上偏离公益组织程序的经费收取,不妨在顶层设计上来一个全面的摸底,否则,无阳光消毒的残保金只会更加“敏感”,脱敏,唯有公开。

□朱昌俊

■街谈

“限高留茬”不靠谱决策能走多远

为禁烧秸秆而对麦茬限高10厘米,安徽太和县的一举措日前在网上引发争议:因为限高增加了农机收割的成本,导致很多收割机离开,并引起种植户的担心,不少网友则批评麦茬限高系“拍脑袋的决定”。对此,当地回应,将会以补贴的形式降低农民的成本。(6月3日《南方都市报》)

“限高留茬”的确给当地农民增加了经济负担。因为“限高留茬”,每亩田将增加六七十元的经济成本。而尽管政策允诺每亩田禁烧可得到20元补贴以及因为成本的增加再可额外得到10元的补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补贴未必能落到每一个人手中。前者的20元补贴,当地环保局领导声称是补贴给购买农机的农户。后者的10元则要通过所谓的验收。也就是说,一亩田因为“限高留茬”增加六七十元的成本是肯定的,而一亩田能否获得补贴30元,则尚待商榷。

因而,尽管“限高留茬”出于推动环保的好意,但我们仍不得不推敲这一政策的合理性。从经济学成本来看,“限高留茬”所带来的影响,势必难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而熟悉基层的人们也明白,一项政策一旦脱离实际,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就难以深入展开与推行。到那时,“限高留茬”的推行者,为了说服民众以及说服领导,莫非要学会某些地区建“遮丑墙”的做法,在道路主干

道两旁,出资建一片“限高留茬”示范区?

必须重申的一个常识是:决策成效并非基于善的出发点就能收获善的结果。基层政府制订政策,不仅要考虑善的决策目的,也应多动脑筋思考决策实现的科学路径。就制止焚烧秸秆而言,更加务实的做法,应是以善政来引导农民。既然规定了一亩田禁烧可获20元补贴,那就实实在在地发放到民众手中,而不要再增设其他多余的门槛,影响民众拿这一笔钱。因为既然是禁烧补贴,又与是否购买农械何干?把补贴落实到位,即是取信于民的体现。而这,毫无疑问比所谓的“限高留茬”更能调动基层农民对禁烧秸秆的支持。

围观“限高留茬”一事,反思不能局限于事情本身的是与非。更需追问的是,这种荒谬政策背后的荒诞思维。“限高留茬”留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关乎一亩地禁烧问题的解决,也同样关乎基层决策是否贴近地气。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当下,同基层打交道,既要着力解决基层问题,更要关心基层民众的所思所虑。拍脑门决策,搞类似“限高留茬”的决策,只能扰民心思,徒损政府形象,而于事无补。从这个意义上说,“限高留茬”提供了一种镜鉴作用,它提醒所有基层决策者,当以此为镜,照亮自身,少做拍脑门决策。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个论

无房也可落户,善政推广更有意义

从去年起,福建晋江率先实行“无房也可落户”,且不再绑定计生政策——在企业,落在企业集体户里;不在企业的,可落在街道或社区所在的公共地址。(6月3日《人民日报》)

户籍与福利本不该有多大关联,但在现实中户口意味着各种福利和权利。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有多高?买房、交通、婚育、医疗、养老、金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以权威的论证,说明了城市户口的显隐好处。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大城市户口附加着太多有形或隐形的福利,甚至成了尊严和身份的象征。

一纸户籍,让多少人悲叹和抓狂?有太多孩子失去在城市就读的权利,或者读了高中却不得不回老家高考;又让多少人在城市里享受不到医保,生了病耗资不小却难以在当地报销?以报道中的老陈为例,他今年50岁,老家在四川绵阳,15年前来到福建晋江务工。到晋江七八年,大女儿上到中学了,因为户口不在晋江,将来的中考必须要回老家考——可老家早没人了。从去年起,晋江实行“无房也可落户”;今年春节前,他和女儿先落了户;3月初,老婆、儿子也顺利落户。老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该让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常常舒口气!农民工为城市发展贡献了青春和热血,他们的孩子却无法就读,读了初中无法在当地参加中考,或者读了高中却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这显然不人道。晋江之所以推出无房可落户,源于朴素的反哺自觉——30多年的开放,让晋江真切品尝到了外来人员对这个全国百强县的巨大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农民工在哪里打工,他们获得了收入,也为城市进步添砖加瓦,城市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各项福利保障。

晋江的无房可落户政策,值得推广。就目前而言,这一政策显

然不容易推广,难在哪里?难在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壮士断腕,难在各种利益格局盘根错节,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语境,难在城市户口附着太高的含金量,当城市户口特别是大城市户口就是高福利的符号时,无房可落户就是奢望。但是,即便晋江这样地方可以做,其他地方也有理由这样做,即便不能像晋江一步到位,也应该逐渐推动,而不是坚若冰山,永远凿不开冰山一角。

当然,有一种担心是,一旦允许无房也可落户,一些城市必然拥进大量人口,公共服务是否不足?这种城市并非多余,但应该看到,拥进的人口绝不只是负担,他们也是创造者,如果把他们当做只占用资源而不是带来创造成果的群体,显然不客观。最关键的是,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让所有的公民享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本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为此,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从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相关部门在协同治理中拆藩篱、填鸿沟,把“户口福利”变成人人共享的改革红利。基于此,无房也可落户,这种善政推广开来,才更有意义。 □王石川

■街谈

重构政商关系,告别“官员独董”

200多家上市公司独董离任,省部级“官员独董”连连去职,兼职官员最短任期仅9天……近期,A股遭遇独立董事离任潮,饱受质疑的A股上市公司政商“旋转门”正在谢幕。去职理由中,受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新规约束排名第一。(6月3日新华网)

“官员独董”,一个中国式政商政关系的缩影。昔日的“来也匆匆”,政企关系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尤其在权力能够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情况下,不仅提供了“商人媚权”与“权力媚商”的土壤,更是加速政商“旋转门”的开启。如今的“去也匆匆”,传递出积极信号——用制度规定关闭政商“旋转门”,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划清权力与市场的界限,把权力及其影响力“关”在门里,让市场在门外自由活动。

政商“旋转门”的存在,见证了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进行曲解。为官期间,有些人以“服务企业”为名,以“发展经济”为由,与一些企业形成默契,建立“政企感情”,苦心经营自己的权力资本,甚至于“结下不解之缘”,从而为今后的从商奠定基础,同时,有个风吹草动的,转官经商是“有效保护”与“明智之举”。对于企业来讲,接收旋转的官员,一方面“感谢”一直以来的“关照”,“知恩不报非君子”;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权力剩余价

值”,或为企业今后生存与发展的捷径。一举多得,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或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衍生品。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内涵,应该是一直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伙伴合作关系。在新型政企关系模式下,政府为企业提供一种平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而非是与个别的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去破坏市场运行规则;政府为企业提供的主要是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而绝非是越俎代庖,替代其决策;政府为各类企业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不是与企业进行交换的商品。

重构政商关系,告别“官员独董”。用新型政商关系关闭官商“旋转门”,或为釜底抽薪之策。实现旋转,一是需要润滑剂,二是需要外动力。官商间的“旋转”,同样如此。从制度上讲,虽然有官员辞职或退休后从商年限的规定,但很多时候沦为形式,在执行环节没有较真。从动力上讲,政企关系的“暧昧”,让两者在利益链上互为动力。只有重构政企政商关系,让政企“各司其职”,扮演好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角色,才能打造出服务型政府、有限责任政府,才能让企业发挥出市场主体的功能,才能让市场发挥出决定性作用。 □王旭东

到利泉商贸
购百年泸州老窖
到利泉商贸
购格力空调
 67533605 66370509 87527979
 63753527 66513335 67713231